

# 党史博览

2002年合订本

党史博览杂志社



# 党史博览

2002·1



**孤军北上做先锋**

**父亲廖承志与母亲经普椿的挚爱一生**

**钓鱼台内外的江青(上)**

**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



本刊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广祥 宋国臣 张赤侠  
张志刚 林英海 范钦臣  
侯志英 阎济民 韩劲草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支树平(省委副书记)  
主 任:李柏拴(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副 主 任:郭迎光(省委副秘书长)  
吉欣逢(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回顾中共历程  
披露决策内幕

追寻历史真相  
展现伟人风采

主 办: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出版:党史博览杂志社  
社 长 总 编 辑:路海江  
副社长 副总编辑:宋 伦 秦相启  
发稿编辑:郑国伟  
美术编辑:王 悦  
网 址:WWW.中共党史网.com  
E-mail:zgdlsw@371.net  
社 址:郑州市金水路省委大院  
邮政编码:450003  
出版日期:每月1日  
电 话:(0371)5904577(编辑部)  
5902254(发行部)  
5904173(传 真)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海 马公秀 王书义  
王应峰 化有勋 甘茹华  
白建新 刘巧云 祁金立  
朱德才 邢 涛 李发军  
李庆瑞 李新增 何振兴  
邹文珠 沈普选 沙庆家  
周权生 杨树新 罗汉忠  
赵金德 屈志祥 段金生  
高道春 姚铁璜 常法武  
舒国文 董 宝 穆润生



张明金 姜为民(4)

## 孤军北上做先锋

——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长征

### 我所知道的王稼祥

杨尚昆(18)

### 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

仇宝山(25)

### 毛泽东与“和平使者”马歇尔

邓西夫(51)

## 博览 之窗

当代贪官的“黑色幽默”·《十送红军》是如何诞生的·东北战场，蒋介石曾想起用张学良·王震与白求恩·在人民大会堂听陈毅做形势报告 (26)

廖 茗(10)

## 父亲廖承志 与母亲经普椿的挚爱一生



# 中将郑维山平反的 前前后后

舒 云(13)



## 跨入新世纪的老一辈革命家

夏远生(44)

## 人民艺术家老舍和北京市长彭真

——舒济、舒乙访问记

王燕玲(22)

## 钓鱼台内外的江青(上)

王 凡(35)



钟  
兆  
云  
(30)

何廷一：  
为周恩来、刘少奇专机保驾护航

## “一大”、“二大”

维 之(28)

## 聂荣臻与五台山僧人

郑立柱(49)

## 长征路上的党小组

李安葆(53)

## 郭老道与红军的历史情缘

卢振国(55)



# 孤军北上做先锋

——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长征

○张明金 姜为民



刘华清同志近影。

6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为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支英雄的队伍,我们访问了原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请他回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关情况,并给了这段历史一些重要的补遗。

**问:**刘老,今年(2001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5周年,您作为当年长征的亲历者,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好吗?

**答:**好的。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

分别编入方面军各师,红七十三师跟随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红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七十五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冈、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一度发展到1.2万余人,并重新组建第七十三师。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二十五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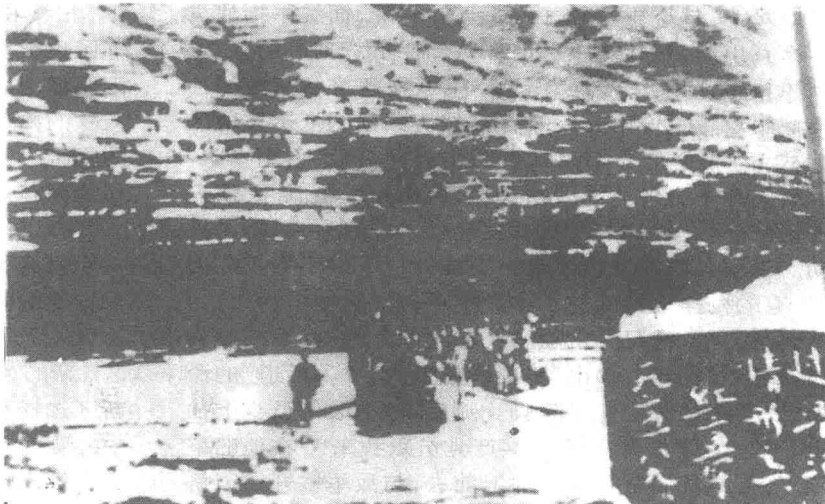
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问：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红二十五军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打出这样一个旗帜？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1934年7月初，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由瑞金出发北上，向闽浙赣边挺进。随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也收到中央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适时转移出去创造新的苏区的指示。为此，在同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西部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从组织上调整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以省委兼军党委，省委书记徐宝珊、秘书长郑位三和军的领导成员均为省委委员。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红军1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始长征的？当时您在部队中担任的是什么领导职务？**

答：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在光山县东南的扶山寨打了一仗。这一仗十分重要。当时，红二十五军为了赶赴鄂东北，商定是否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部队十分疲劳。刚到扶山寨地区休息，尾追之敌10个团就跟踪而至，形势十分紧迫。当时，不把敌人打退，省委就不能安全讨论转移问题。为此，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在扶山寨伏击跟踪之敌。一举毙伤俘敌约4000余人，使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踪追击了，为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之前，部队各级党组织向全体指战员讲形势，讲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叫“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出发前，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渡过渭河的情景。

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这是长征出发前整编决定的。长征出发时的《宣言》是我亲自刻印的。同时还刻印了其它一些传单，并张贴布告，书写标语等，对战士进行宣传动员，使每个同志都树立革命必胜、长征必胜的信念。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

答：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11月17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省委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





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风冒雪,向北突进。26日下午,我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脚。随后,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当时,我就在吴政委的身边,也高喊着冲了上去。正冲杀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腿上,我觉得左腿像突然被谁狠击了一下,就摔倒了。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冒雪踏上征程。

**问:听说这次战斗后,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全部留下,是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同意给您一匹小马骑,才使您得以离开险境,跟上大部队安全转移的?**

答:是的。这次战斗后,为了使部队迅速摆脱敌人,军领导决定让我和部分伤病员留在当地养伤,可是不愿意离开部队,便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转移。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才同意让我骑马走,得以跟上大部队安全转移,这件事情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绕到守敌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了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打破了敌军的两次“围剿”,这段历史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您能把这段历史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红二十五军开始是准备在伏牛山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该地区人烟稀

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也很困难。因此,省委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我军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后,于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上,省委正确分析形势,认为鄂豫陕边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遂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

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对西南的川陕苏区、北面的陕甘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都可以起配合作用。为此,红二十五军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全力投入创建新苏区的斗争。进入陕南之初,红二十五军只有2500余人,在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多次抽调领导骨干和部队去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二十五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燃起的革命烈火,引起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慌与不安,便急忙调动军队发动“围剿”。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两个团和驻湖北的第四十四师,在陕军第一二六旅的配合下,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之敌,我军采用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则迅速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经过蔡玉窑、文公岭两战,给单独冒进的陕军第一二六旅以重创。战后,我军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5县边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在陕东南开辟了第二块根据地。接着,又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在华阳镇东南的石塔寺附近设伏,歼灭陕军警二旅5个营。战斗结束后,我军在华阳地区建立了7个乡的革命政权,开辟了第三块根据地。4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东返,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将一路跟踪追击的陕军警备第三旅两个团打垮,毙俘共1000余人。随后,我军攻克洛南县城,又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广大群众在红军战斗胜利和获得翻身解放的鼓舞下,革命情绪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我军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合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是红一方面军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二十五军得以休整，并不断发展壮大。到5月初，主力红军增至3700人，另外还有游击师、抗捐军等地方武装2000余人。

**问：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二十五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进行了袁家沟口等一系列战斗，并最终夺取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这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史上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例。您把这段战史的情况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连战连捷，使鄂豫陕边区的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蒋介石大为震惊，紧急调动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第六十七军和驻郑州的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会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我军对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早有准备，决定以根据地作依托，针对敌军运动和补给困难等情况，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再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6月初，我军以地方武装袭扰、牵制敌军，主力自郧西向北，转

至外线捕捉战机，经商南奔袭荆紫关兵站，缴获大批弹药物资。当敌军蜂拥增援荆紫关时，我军又挥师西行，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的袁家沟口一带。袁家沟口是一条长达10多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我军在预选战场设伏待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顿时，群山军号响，满谷杀声起，各种火器向密集之敌雨点般扫射，红军各连队勇猛插向乱作一团的敌群。经过约10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7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支。我军仅伤亡100余人。袁家沟口战斗后，我军得到了物资和兵员补充，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致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准备保卫西安。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行动，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也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的两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战屡胜，战果也愈来愈大，并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其作战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标志着红二十五军领导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问：您刚才谈到，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请问，您们在孤军远征的情况下，是怎样与中央红军保持联系的？**

**答：**红二十五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部电台，以便能够得到中央的指示。”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我们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



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胜利并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留在鄂豫陕苏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七十四师,在郑位三、陈先瑞领导下坚持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离开鄂豫陕苏区,又开始了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

答: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记得徐海东副军长当时在动员大会是这样表达决心的:“我们这次西征北上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这对全国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红二十五军经户县、周至,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挺进,于7月31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陕西凤翔县县城),歼敌一部并俘虏敌

少将参议一名,缴获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7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朱、毛红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挺进。综合敌人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马鸿宾等部,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以及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全力堵截红军。据此,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

8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尔后翻越麦积山,攻占天水县城。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我军以神勇的行动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我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红二十五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急调驻川西国民党军,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原准备南下堵截中央红军的一个师和一个旅也不得不改变计划。这样,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 问:听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曾经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您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讲讲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过程中,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8月中旬,我军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这里是回民聚住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他让我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标语,贴到街上。他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等医护人员还热情为群众治病。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十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队



1937年1月,红十五军团在商县与红七十四师会师时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前排左起:郑位三、徐海东;后排左起:李隆贵、程子华、陈先瑞。



伍。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受到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诉说了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夸奖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所做的群众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问：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甘地区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并用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您是怎样评价这件事情的？**

答：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后，沿西兰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在途经泾川城西南的四坡村时，部队遭到敌三十五师的突然袭击。在激战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指战员们怀着极大的悲愤，与敌展开殊死战斗，歼敌一个整团后冲出重围。吴政委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时全军指战员悲痛欲绝，我也流了很多眼泪。吴政委是我们的军魂，是军党委领导的核心，是指战员的主心骨，我们都十分爱戴他。吴政委壮烈牺牲，我们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8月中旬至下旬，红二十五军为进一步钳制敌军，积极活动于隆德、平凉、崇信、灵台、泾川、华亭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到了战略性配合作用。

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地区与敌周旋期间，每天都派人探寻中央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但都一无所获。此时，敌第三军、第五十一军、第三十五师等各一部，从不同方向向红二十五军活动区逼近，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处境不利。省委和军领导鉴于一时难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便决定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合，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再配合红军主力北上。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次击败尾追的敌军，于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会师后，为统一指挥作战，两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7000余人，极大地增强了陕北的革命力量。当时，蒋介石调集了东北军11个师及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部队，正在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指挥下，先后发起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后来，徐海东同志曾经写了《奠基礼》这样一篇回

忆文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情景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答：10月19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此后，原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在红十五军团编制内，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作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36年10月，红十五军团随同西征红军攻克西北重镇会宁城。不久，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联欢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红军大会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红军会师。虽然时光已过去60多年了，但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那欢腾雀跃的场面，那团结胜利的气氛，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历历在目。

**问：尊敬的刘老，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把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这段难忘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解读了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孤军北上的光辉业绩，也给了这段历史一些重要的补遗。时光已经过去60多年了，您还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见这段历史在您的人生中已经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答：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壮丽史诗中辉煌的一页。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的长征历史，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过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不仅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永恒，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称赞过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感到这既是对徐海东个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勇做先锋的高度评价。

60多年的沧海桑田，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没有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谈不上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回顾红二十五军和其他各路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我们不仅为长征的艰苦卓绝和英勇悲壮而铭心，更为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深远影响而自豪。因此，我也要谢谢你们对我的采访，并希望通过你们的文章把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昭示我们的后人，让长征精神千秋永存。□





# 父亲廖承志与母亲经普椿的挚爱一生

○廖 茗

1997年9月,我80岁的老母亲去世了。

作为经常的陪伴者,我本应最为悲伤,可令人费解的是,我却十分平静。这是因为,我把母亲的离去,视为她与在天之灵的父亲在离别16年后的重新相聚。

聚少离多,本是父母亲几十年来婚姻生活的概况。那么,如今他们终于可以日夜相伴、朝夕共处了。正像父亲在一首纪念他们结婚30周年的诗中所写:

每逢此日分离惯,  
且望他年聚首多。

我想,这一定是对母亲的远离不那么悲痛欲绝的最大原因。

父亲母亲是1933年相识的。那年父亲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由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等7位国民党著名人士联名作保,加上祖母何香凝四处奔走,据理力争(甚至还搬把藤椅,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办公室门前“静坐”),父亲这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祖母将儿子好心地关在家中,却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段姻缘。

著名国民党左派、教育家经亨颐先生(后来成了我的外祖父),那时与祖母相邻,又常让女儿(即我母亲经普椿)过来照料“廖伯母”,这就使父母亲得以结识。

就在这期间,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毅然离开了疼爱他的母亲和恋爱中的“阿普”(父亲对母亲的昵称),留下一幅为

母亲精心绘制的油画肖像及致母亲和“阿普”字条各一,便踏上了革命的征程。这幅油画历尽沧桑,在母亲床头高挂,似在无声地诉说与见证着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母亲于是就开始了痴心的等待。

在这期间(约为4年),母亲一位兄长(即我的舅父)扣压了父亲全部的来信与电报。可是,这“拙劣”的小小伎俩怎能阻挡住坚贞爱情!“好事多磨”,父母亲在1938年终成眷属。一切阻挠均告破产。

父母亲的结合甚为神奇,致使本是无神论者的我不禁也想,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操纵人间悲欢离合的主宰存在。

当母亲离开故乡(浙江绍兴),千里迢迢、几经辗转终于到上海找到祖母时,祖母却正准备赴港与爱子会合。由于母亲没有船票,祖母提议母亲睡在自己的舱中,就这样到了香港。到港之后,父母亲就幸福地成了婚。

这可真是“天缘巧合”。我常常想,如若母亲迟几天到上海,就见不到祖母,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婚了,人间也许就少了一桩美满的姻缘。

革命的道路充满艰险,灾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降临到战友、亲人甚至自己的身上。1946年4月8日,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不仅使“躲过一劫”的父母体验



了与战友生离死别的滋味，心中充满了“幸存”的负疚感，而他们崇高的友谊、广博的爱心也在我早期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天，由重庆飞往延安的一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乘客是大名鼎鼎的叶挺、秦邦宪（博古）、邓发、王若飞，以及叶挺夫人李秀文、其子阿九、其女扬眉、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及其外孙。

我的父母亲原定也乘此机赴延安。临行前，由于周恩来让父亲赴粤商谈东江纵队北撤事宜而取消了此行。父母由此空出的两个名额，就补上了黄老先生和他的外孙。

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父亲被捕入狱。经党中央大力营救，以交换俘虏的方式（我方释放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使叶挺和父亲得以恢复自由。叶挺将军被俘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父亲出狱之日是1946年1月22日，叶挺则是3月。

据母亲回忆，4月7日这天，听说要回延安，她便兴冲冲而小心翼翼地整理衣箱，还特地出去买了延安所没有的热水瓶、饭盒。母亲那时已经怀孕（就是12月底出生的我）。由于这次怀孕是“锦上添花”（父亲恢复自由不久），故母亲行动分外小心，生怕闪失。

母亲在追忆此事时常常感叹道：“一想起黄老先生我就揪心，倒好像是替我们去送死似的。”我常常想，这种“幸存”的负疚感必定伴随了父母亲许多时日。

为纪念“四八”烈士，父亲为叶挺写了长长的挽联，还有一篇稀世佳作《遥献》。挽联写道：

同乡同志铁窗中同难今日悽怆独奠酒



多少次血与火的考验，多少次周全而无言的关怀，铸就了他们之间亲密、崇高的友谊。图为1953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期间，廖承志与周恩来、彭真在一起亲切交谈。

齐德齐心赤旗下齐勉他朝谷乐再招魂

叶挺与父亲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先后入狱，又一同恢复自由。他们平素私交甚好，以兄弟相称。扬眉称父亲为舅舅，这在《遥献》一文中也曾多次提到。

可以想象，他们在先后获得自由之后，又将同赴延安，心情会是何等喜悦、激动。

父母亲未能同行，偏偏叶挺一家又赴黄泉。父亲在《遥献》中描写他们父女在久别之后的感人重见，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

一个灰白头发的人从车里钻将出来。呵！疯狂的鼓掌！拥抱！有些同志忘形地抱着对方跳起舞来了。

进了屋子。一个两条小辫发、穿工装、脸色像牛奶似的小小人儿，扑过去了。

“爸爸！”

“扬眉！”

一切景象都模糊起来了。好像沉在水里——每个人的面颊上，都挂着几颗水珠……

父亲还充满感情、活灵活现地描写了扬眉的鲜艳动人：

扬眉的鞋儿又在那里

——渐渐这鞋儿上面长了腿，多了一段灰色的工装裤，两条小辫发、玫瑰色的面颊……

简直活脱脱画出了一个极为明媚可爱的少女。我虽未见过扬眉，但父亲的描写令其呼之欲出，使我就如同看见了她。母亲在谈及扬眉时总是赞美备至。我起先认为那不过只是一种美化的哀思，直到亲眼见到了她漂亮的妹妹剑眉，才知母亲所赞不虚。

“四八”后，父亲收养了剑眉。父亲对剑眉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子女。

为自己的孩子，父亲从未求过别人，而为剑眉，父亲能求。我至今记得，为了把剑眉从天津转学到北京，父亲打长途电话给天津南开大学校方，说明让其转学的原因，请求校方协助。这种罕见的破例作法，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很诧异地望了望妈妈，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拍了好几下我的头顶。

这次空难，父母躲过一劫，这全是周总理有意无意的“搭救”。而这样的“搭救”又何止一次呢？

我常想，也许我的“幸存”只是阴差阳错。周总理决不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后来的灾难，故令我父改赴广东，因而父母此次的脱险，或许纯属偶然。

在周总理和父亲历经各种艰险的战斗生涯中，这或许只是千万次惊涛骇浪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根本不值一提，但对我而言却非同小可。真的，仔细想想，实在“后怕”。如果父母上了飞机，那么岂非连同尚在混沌之中的我一道成了烈士？冥冥



之中,光芒万丈的周总理,用他那虽已致残却仍有扭转乾坤之力的臂膀,将我们揽在了怀中。

时过境迁,岁月悠悠。“四八”空难发生的年份,恰恰就是我出生的年份。这也就是说,“四八”空难距今多少年,我也满多少岁。因为是周总理神奇地保全了父母及我的性命,多少年来我总是把周总理当成“再生”的父亲。这可能是“大不敬”(因他曾在黄埔军校和我祖父共事),至少也是有些迷信色彩的吧,但我虽深知,此生却永难改变。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也更多、更深地了解了父母亲。无论是环境险恶还是衣食富足,父亲总是对母亲一往情深,母亲也总是那么不遗余力、始终如一地支持父亲。

这在十年浩劫中,最为突出。

那时,祖母年事已高,父亲遭到“审查”,几年不能回家。7个儿女又分散各地,一家七零八落,日子苦不堪言。在这国欲破、家欲亡的时候,母亲以瘦弱的双肩,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母亲咬紧牙关,每周一次去“监管地”看望父亲。距离虽不远,却需换乘好几次公共汽车。母亲每次都把干净的衣物带去,再将需洗刷之物带回。有时,还要肩扛厚厚的被褥。坐车次数多了,母亲还摸索出一种挤车“窍门”:等车停稳后赶紧找个离车门较近之处站定,这样车门开后,就较易上车,并较易找到座位。

这种“窍门”,虽很苦涩,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与父亲患难与共的决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次从“监管地”回来,母亲都“喜形于色”地赶去告诉祖母:“妈妈,肥仔(祖母对父亲的昵称)有消息了!有代表团从国外回来,他们在大使馆看到了肥仔。”

每逢此时,祖母虽心存疑虑,也都乐得颤巍巍的。而母亲的心,却一定是酸得颤抖抖的。

年幼的我,当时对这一幕情景并不理解,总是不以为然,或认为大可不必。如今我成人了,才深知这种善意的谎言是出自一种怎样深情的良苦用心啊!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为“保护”一大批受“冲击”的干部,让他们搬入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居住。父亲即在其中。

为了不使祖母牵挂,父亲就与母亲“统一口径”,说自己是受“周公”(祖母一直称周总理为“周公”)委派,“长期出国”。母亲几年来一直遵照这一说法,把一切屈辱、辛酸、劳累统统咽下,在白发苍苍的祖母面前竭力做出喜悦表情。无怪祖母在久卧的病榻上,紧紧握住母亲辛勤操劳的双手,未语就泪流满面。婆媳间一切误解顷刻冰释。

记得“文革”前,父亲经常出国,亚洲、欧洲、非洲……许多地方都留下了父亲匆匆的足迹。每次归来,父亲必给祖母和母亲带回一些小礼物。带给祖母的,常是一顶帽子,带给母亲的,多是一块手表。年幼的我曾很惊异地看到,母亲居然和所有前去接机的工作人员一样,

纪70年代)。

经历了无数次的大风大浪,年迈的何香凝早已是荣辱不惊(摄于20世



与走下舷梯的父亲紧紧握手。如今回想,这貌似平淡的握手,该是隐含了多少揪心的担忧、多少牵肠挂肚的想念!

父亲的一往情深,还表现在他从不示人的诗作当中。

在20世纪40年代失去自由的4年监狱生活中,父亲写下了不少怀念家人的诗句。也许是由于身陷囹圄,诗情倍加浓烈。提及母亲的就有6首之多。

在狱中,面对屠刀的父亲曾写下《诀普椿》,深情相劝:“白发人犹在,莫殉儿女情。”“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坚信“廖家多烈士,经门多隽英。”“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在十年浩劫、人妖颠倒的日子里,父亲怀想家人的诗篇就更为凝炼感人。有一首写于1968年1月11日纪念他们结婚30周年的七律,题目就叫作《一月十一日》。诗中写道:“每逢此日分离惯,且望他年聚首多。”“白发相偕愿已足,荒山野岭共销磨。”这最后一句,我视为点睛之笔,既概括了父母亲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同时也表明了父亲内心深处对婚姻生活的最高理想。而这个境界,我作为他们的女儿,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旁观者,尤其每当清明节,望着他们连骨灰都合在一起的小小木匣,我深深相信他们是达到了。松涛、花香、清风,分明和他们美好的情感一起,在向着更为高妙的所在,飞升……□



# 中将郑维山

## 平反的前前后后

○舒云

2000年5月9日，中将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病重期间，郑维山一再要求医院停止治疗和抢救，省下钱用来统一台湾。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这和他的性格一样。他生前出版的惟一的一本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也是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反映战役指挥及战役全部，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的英明及部队指挥员的英勇善战。他认为自己个人的经历没有什么好写的。平时，你如果遇见散步的郑维山，看到他干瘦干瘦，穿着一件离休老干部常穿的衣服，你怎么也不能把面前这个小老头和叱咤风云的将军联系起来。

4月19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曾先后在北京军区、兰州军区任司令员的郑维山，向病床边的夫人孙景波，大儿子郑勤等6个子女断断续续地口述给中央军委的信。大意是，我身体日渐不支，感觉日子不长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的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

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郑维山去世前，对一个人念念不忘，这个人就是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郑维山对“文革”中和自己一起落难的老秘书杜辛说，你和徐处长还有来往没有？我死后，叫他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他还把自己写的《从华北到西北》一书签上字送给徐厚田。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谢。

在“文革”动乱中，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郑维山，在逆境中主持工作，忍辱负重，尽职尽责，苦撑局面。尽管他小心再小心，最后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倒。那时“四人帮”反复闹，想通过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从郑维山这里打开缺口，搞倒聂荣臻，搞倒周恩来。郑维山宁肯被打入地狱，也不愿连累周恩来。在抄家前，他把家中有字的纸全烧了，其中有好多信牵扯到周恩来。直到死，他都保持这个习惯，有一点字都撕得碎碎的。在华北会议上，江青跳得很高，信口雌黄，郑维山公开顶撞她。江青恶狠狠地说，我一说，你就顶。她表示不能放过郑维山。

1971年1月，李雪峰和郑维山受到批判。中共中央决定，将李、郑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当时并没有结论。周恩来讲，停职学习，待分配。郑维山被隔离在安徽。名义上党籍和行政大区正职还保留，但实际上谁也



1967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郑维山。在这位爱将面前，毛泽东曾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你们都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不管,是软禁起来了,整整与世隔绝了8年。他的3个秘书和家属子女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牵连,不许留在首都,不许在铁路沿线,不准在部队……同时被处理的李雪峰,比郑维山的处境更坏,开除了党籍,但李雪峰的平反比郑维山早,而郑维山却一直挂着。

郑维山和他的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平反之路是这样的艰难。

郑维山的爱人孙景波在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当政委,郑维山出事后,总政让她一起走,她带着最小的儿子和郑维山关在一起。因长期精神受压制,得了精神病,反复住了几次院,病情好好坏坏。1978年她回北京治病,找到重新回中央任职的胡耀邦。在解放战争中,郑维山和胡耀邦共过事,郑维山任第三纵队司令员,胡耀邦任第三纵队政委,彼此工作得很愉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耀邦问,老郑呢?怎么中央也找不到?郑维山被关起来后,代号“老关”,连看守郑维山的部队官兵都不知道,北京哪儿会知道?

其实,郑维山有好几次平反的机会,都错过了。1971年5、6月间,中央要给郑维山安排工作,纪登奎和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找他谈话,说中央委托我们找你谈,你是认识问题,再进一步认识可以安排工作。郑维山让秘书杜辛起草了检查,已经交了上去,还让进一步认识,怎么认识?郑维山脾气比较大,火了: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怎么处理都可以。华北几十万军队说成反革命军队,几十万干部说成反革命干部,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郑维山越说越气,拍了桌子,力气过大,把桌上的3个茶碗全震翻了,茶水洒了一地。

安排工作的事“黄”掉了,对此郑维山没说过后悔。

对于郑维山来说,机遇不止一次,但他不会奉承,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与周恩来也闹翻过。“文革”中,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300多万人,天安门广场装不下。如果分两批,毛泽东受不了,红卫兵也受不了,就决定安排在长安街,毛泽东坐吉普车东西走一走。但郑维山认为长安街两边,暗处太多,哪棵树,哪个楼,哪个窗口,伸出个枪来,不好警卫。不如安排在西郊机场,开阔,200米内藏不住人,而且相对封闭,好警卫。周恩来表态不明确,郑维山发火回家了。刚到家,电话来了,周恩来说,维山你来,你讲的有道理,我们来研究一下。郑维山就是这样,脾气大是大,但只要认为正确的,他就坚持,不管得罪谁,掉脑袋也不怕,更何况职务。不安排就不安排,要他违心低头他不干。

## 二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中将郑维山的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作出结论。聂荣臻嘱,请总政干部部阅处。

给郑维山作结论的工作交给处长徐厚田办理。徐厚田是老总政了,1957年合并总政时他任副处长,“文革”中总政被“砸烂”,他也被调任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后因参加落实政策未到职。“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了包括罗瑞卿、萧劲光、许光达、黄克诚、刘志坚、史进前等几十个所谓“反党集团”在内的大案要案的平反工作。直到“文革”后,徐厚田还继续搞落实政策工作,一直搞了7年。离休后,仍接手了几个大案,直到现在还不断有案子找他。

“文革”后期,毛泽东已感到大批干部被打倒有问题,我们的干部中叛徒特务怎么会那么多?而且关在牛棚里迟迟解放不出来,因此毛泽东提出解放干部。那时还不叫落实政策,就是说解放出来,交给周恩来办,分配工作。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一个会,军队也派人参加。周恩来提出复查,把军队的案子移交军队系统。那时“四人帮”还在,搞专案的是一、二、三办。三办是公安部,主要是一办和二办,在张自忠路坐北朝南的三套院子里办公。“文革”结束后,一办、二办撤销,徐厚田去接收由一办立案的军队干部的材料,包括贺龙的材料以及“六十一人叛徒案”中有几个军队人员在内的材料共有二三百份。以后不止“文革”时期,包括历史问题,甚至长征中的冤假错案,都找上门来了。落实政策不那么简单,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平反的,时间地点不同,案件很复杂,一开始是“四人帮”的阻力,后来是派性,还有思想观念的转变。比如刚开始有的落实政策办的人还是当年整人的人,叫他落实政策推翻自己怎么可能?总之那时平反阻力还很大。当然,具体到郑维山身上,阻力就更大。

## 三

本来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就以为自己的问题该搞清了,没想到江青却倒打一耙,把“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刚刚盼到天亮的郑维山又跌进黑暗中,从反林彪的急先锋变成了伙同林彪反党的一员大将。这下罪名就更大,被押往安徽山区的一个农场监督劳改。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两点意见,一是郑维山的结论由总政做,二是由北京军区做。因为郑维山在关押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建议请北京军区作出审查结论。

1978年12月12日,北京军区请示总政,说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负责作审查结论。从郑维山关押到此时,整整一个“抗日战争”(8年)已经过去了,北京军区换了好几茬领导,现任领导对那时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皮球”很有道理地又被踢了回来。

北京军区现任领导不了解情况,总政就更不了解情况了。

没办法,郑维山家人又找到胡耀邦。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有关同志交代处理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等人



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

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这样,“四人帮”倒台两年后,郑维山才结束了“劳改”,回到了北京,住在总参第二招待所,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人是回到了北京,但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郑维山认为,自己个人平反的事情不急,先要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在这顶大帽子下,北京军区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牵连,至今问题仍没有解决。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写报告给胡耀邦,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 四

要弄清郑维山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就要从“杨余傅事件”和华北会议说起。

江青说,“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这个“山头”很大呀!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大得很呀,而且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完全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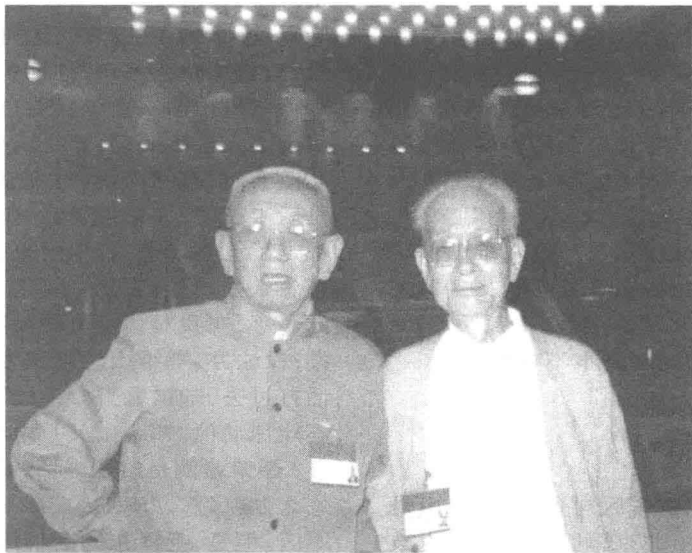
江青红口白牙下了结论,华北是坏人当道。

在那个特殊年代,被江青点名,等于在政治上判了死刑,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1968年3月24日,在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会上,捏造了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北京军区党委第12次扩大会议。会议开了50多天,在批杨、余、傅的同时,上批“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下批原在华北工作的郑维山和参谋长萧文玖。会开了那么

长时间,老是揭发不出什么实质问题。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险些病倒。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这件事才算勉强收场。但从此,一连7年,北京军区就笼罩在“华北山头主义”的阴影里。

“杨余傅事件”中,北京军区被诬陷为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被强令揭批“山头主义”的罪行。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舆论,诬蔑北京军区“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造谣说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对干部的正常调动处理,都和所谓的“山头主义”联系起来。

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召开的华北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大,后一段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的军委会议也搬了进来,开成了一个全军性的会议。



劫后余生,郑维山(左)、李雪峰(右)这两位饱受“四人帮”迫害的亲密战友,不仅目睹了“四人帮”被送上审判台,更有幸目睹了中国拨乱反正以来的大好局面。

江青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说“华北山头”是反林彪的,现在又把“华北山头”说成是跟林彪的;原

来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现在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现在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现在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说郑维山是山头主义窝子的黑窝主,除继续批判郑维山外,还变本加厉,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华北山头的第四套班底”作为靶子,加以批判。

于是,郑维山还是继续被关押。

#### 五

1979年初,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军委聂